

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 现象与挑战**

费海汀*

【内容提要】学者在使用思想史方法对当代政治思想进行研究时,须考虑作为基础的研究材料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对方法予以反思和完善。在这一信息化和后真相时代,俄罗斯政治思想研究面临传统材料变化与非传统材料增多两方面的挑战。传统材料呈现出系统性、不确定性的特点,非传统材料则呈现出碎片化、情绪化的特点。为此,对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想进行研究,一方面应从政治观念、政治人物与派别、文本档案三要素入手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对传统材料进行分类和跟踪;另一方面应尝试从角色、关系、客体、环境、象征、语言六方面入手探索研究方法,对非传统材料进行观察与分析。同时,对两种材料进行的研究都要保持动态的视角。在当代政治思想研究中,正是材料本身的变化常常象征着政治格局和走向的演变。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思想 俄罗斯政治人物 俄罗斯精英 俄罗斯政治观念 俄罗斯政治语言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3-0106(25)

一、序言

政治思想研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在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中,政治思想研究从方法的角度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研究、政治心理研究、政治思想

* 费海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史和意识形态研究等；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则是包括了政治话语、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概念、政治认同、政治立场、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等等。

要理解俄罗斯政治的发展变迁过程和总体逻辑，思想史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项之一。政治学研究中的思想史方法，主要是对古代或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进行解读，以求理解其理论体系，把握他们的分析框架。那么，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到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时，它是否仍然适用？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即政治思想研究的材料，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否存在根本性的改变，或具有了全新的特征？本文将尝试从政治思想研究的三个要素（即政治观念、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别、文本档案）着手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二、传统材料的变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运用思想史方法对当代政治思想的材料进行分析时，不可避免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正如《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所反思的那样：“政治理论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实践上的困难，是当代政治科学所收集的经验性材料太多。经典政治理论家则无疑的是一些非专业的政治科学者，他们只是依靠随意的观察和无意的道听途说来收集资料，而他们的后继者则往往因系统收集的资料而不知所措。”^①总结而言，运用思想史方法对当代政治思想进行研究，首先会面临的困难，是系统性材料的出现。这一困难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系统性，二是材料的不确定性。

材料的系统性，是指历史材料的不断累积和新材料的不断增长。一方面，由于档案技术的发展及电子化程度的提高，当代政治史的许多原始材料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获取或阅读，且无论是从材料的数量、可信度或是完整性来看，与传统档案馆的材料相比都并不逊色。这就使得研究者有可能超越地域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翻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76页。

的限制，对当代世界政治史作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考察。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政治人物或是政治组织，都在努力改进自己开展政治沟通的方法和渠道，这就使得政治思想研究的材料从内容和更新频率上，都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许多政治人物或政党都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与信息平台，其信息更新速度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频次。这一新进展对于研究者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好处是研究者不仅很容易即时、准确地获取某一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别对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和观点，坏处是当代研究者在材料的类别和材料所提供的信息量上都不得不对和处理比过去更加复杂的局面。

材料的不确定性，则是指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材料始终处在一个内容、数量和类型都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思想史所面对的材料从内容上来说则是静态的，从数量上来说则是确定的。即使历史研究能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其数量也很难出现突然的增长。但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所面临的材料，是不断累积、不断改变的，这就呈现出动态的、不确定的特点。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作为政治思想载体的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别的登场与退场；（2）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别观点与立场的变动；（3）政治人物或政治思想派别对政治观念论述的更新。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研究者根据既有材料得出的关于政治格局、政治倾向、政治走势的论断极有可能出现变动，甚至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面对这种系统的、不断变化的材料，许多研究者会选择直接求助于量化研究方法。那么，是否质性研究方法已经陷入困境呢？实际上，量化研究方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量化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研究对象的确定。这一方面是指政治观念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指政治观念载体（包括人物、派别与文本档案）的选择。但这一研究前提的提供，依然需要依靠研究者对政治发展变迁全过程的整体把握。可见，面对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材料的系统性问题，无论传统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还是机器学习、数据抓取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无论是量化研究方法还是质性研究方法，都必须首先通过分类的方法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架构，对政治观念、文本档案和政治人物及政治派别进行归类处理。

进行这样一种分类的目的，除了能对政治史作更加系统的梳理与理解之

外，还在于能帮助研究者确立一个动态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政治人物、政治派别、政治观念和总体政治倾向的跟踪研究。在确定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后，研究者就将会更容易通过“替代性语汇”^①的发展过程，捕捉到从政治观念到政治人物、从政治派别到整体政治趋势的种种变化，从而及时更新自己的结论和判断。例如，当标明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话语中，对个人权利的宣扬逐渐转变为对集体影响的论述，或对个人自由的重视逐渐转变为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当政治领袖的话语中，对个人权利的强调转化为对个人义务的强调时，就可以获知人物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例如，当出现一个新的政治人物，或相当数量的材料，不符合既有的分析框架时，就可以对框架进行反思：俄罗斯社会是不是出现了某种转向或达成了某种共识？

例如，当不断出现新兴政治人物，且政治人物的论述、政治人物的立场，与既有框架相比都出现很大的变化时，就可以考虑，俄罗斯政治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进行分类尝试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当代俄罗斯政治中一些核心政治观念从诞生、讨论到传播、扩展、接受的全过程。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俄罗斯政治中的人物和派别，应遵循从主体到客体，即从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别到政治观念的逻辑回答下列问题：谁在影响俄罗斯政治？谁在推动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分别秉持什么样的政治观念？他们所秉持的政治观念存在怎样一个变迁的过程？

要回答政治人物和政治派别的问题，俄罗斯学者关于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些成果可资借鉴。马加利（С.А. Магарил）认为，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并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常将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发展分离开来。他反对政治精英主导政治现代化的模式。他认为国家机关的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重合。同样，商业精英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商业精英由于大多是靠任命制起家，属于流氓资产阶级，因而并不具有责任心和战略思维。在非精英阶层，也没有推行改革的基础。非精英阶层的国民大多数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仅限于支持一个强力的最高权力。他们期望最高权力能够超越社会之上，控制精英和犯罪势力，扮演自己保护人的角

① [英]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景跃进、张小劲、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色。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但在没有公民的、不健全的民间社会，却不存在一个能够推动改革的社会阶层。^①马加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改革。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通过教育来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知识精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因而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价值引导的方式教育社会，培养国民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②

加曼-戈卢特维娜（О.В.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则认为，即使在俄罗斯社会剧烈分化的过程中，在许多诸如贫富、央地、意识形态或民族种族矛盾之中，贫富差距始终是俄罗斯的核心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внеэлитные массовые группы）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短时间内决定俄罗斯政治走势的最重要因素，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对社会的态度。她指出，后苏联时期出现了“精英的革命”，使得这部分精英今天已不仅成为俄罗斯政治进程最重要且几乎是垄断性的参与者。^③但是，实现精英垄断的机制却是在不断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前半段，政治领域基本处于执政精英和反对派精英的二元对立。而1999-2000年的选举完全改变了这一局面，当权者和反对者的二元对立开始进入政治精英内部竞争的时代，并且逐渐步入统治精英内部竞争的阶段。因此，统治精英内部的分歧，自由派或强力派更占优势，都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俄罗斯政治的走向。

二者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并不矛盾。马加利是从应然的角度分析政治现代化的推动者，加曼-戈卢特维娜则是从实然的角度分析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主要影响者。瓦西里耶娃（О.В. Васильева）同样是从影响力的角度分析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她指出，改革的本质即是对社会的子系统进行革新，同时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素质，一方面可以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展现出接受、理解

① Магарил С.А. Очеред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базис общества// 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я: Приоритеты выборов и выбор приоритетов», 2003.

② Магарил С.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2.

③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роцес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элитогенеза: мировой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й опыт// Полис. 2008. №6.

并推动新事物、新理念的能力。政治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效率、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政治沟通新技术的应用和后工业化时代价值与观念的引入。而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在效率 and 专业化程度方面，都难以胜任第二个要求。同时，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并不平衡，因此在对其进行研究和评估时必须考虑各地区不同的进度与特点。^①由此可见，无论是政治精英或是知识精英，都无法单独承担推动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p>最高权力 (Верховная власть): 总统及决策者: 7-10 人</p>
<p>统治精英 (Правящая элита): 总统办公厅; 联邦政府领导层; 联邦级别媒体的所有者或领导; 国有企业领导: 约 100 人</p>
<p>政治精英或管理层 (Элита или «управляющий слой»): 行政、立法、司法和舆论权力机关的领导人; 大型企业的所有者; 地方政治领袖、联邦或地方最高级别官员; 科学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代表: 约 1000 人</p>
<p>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 (Правящий класс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中层干部 (各司局领导人、副省长)、市长及大区区长; 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区议员; 大型 (地方企业) 负责人; 知识分子: 约 50000 人</p>

^① Васильева 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литы как субъек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Дис. канд. пол. наук. Астрахань, 2014.

俄罗斯政治学者波德别列斯基（А.И. Подберезкин）曾将俄罗斯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分为四个层次：**最高权力**（Верховная власть）、**统治精英**（Правящая элита）、**政治精英或管理层**（Элита или «управляющий слой»）以及**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Правящий класс и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①最高权力包括总统及能进行决策的 7-10 人；统治精英包括总统办公厅、联邦政府领导层、联邦级别媒体的所有者或领导、国有企业领导约 100 人；政治精英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和舆论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大型企业的所有者、地方政治领袖、联邦或地方最高级别官员、一些科学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代表约 1000 人；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的构成要素和政治精英基本一致，只是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层次稍低，同时还包括中层干部（各司局领导人、副省长）、市长及大州区长、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区议员、大型（地方企业）负责人；知识分子等共 50000 人左右。^②

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政治精英”结构在统治精英层次开始出现分化，增加了大型媒体的负责人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即舆论和商业领域的代表。在管理精英层次基本定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舆论四类权力机关代表，以大型企业领导人为主的商业机构代表，以地方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及科学、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代表四类。之后政治精英的组成部分就只存在层级的区别，几乎不再囊括新的团体了。例如权力机关代表在联邦层面增加了各司局负责人，地方层面增加了副省长、市长和大州区长；地方精英代表增加了各代议机构中的议员；商业精英代表增加了大型地方企业负责人；知识分子也相应扩充了所在的领域和人数。简而言之，这一分类方法将俄罗斯政治结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总统及决策者直接决定政治进程；第二类包括行政、舆论与商业领域的领导人直接影响政治进程；第三类则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共同分享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波德别列斯基的分类方法认为在“政治精英或管理精英”层面，政治精英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联邦精英和地方精英；而在“统治阶级或政治阶

① 值得注意的是，波德别列斯基所使用的“政治精英”一词是广义上的，即“能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而非“政治体制内的精英”。

② Подберезк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Москва, 2011. С.271.

级”层面才出现了行政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区别。这一分类方法是按照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影响力来划分的，因而也就可以认为，联邦与地方精英间可能存在的分歧，要比政治与行政精英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更能影响或反映俄罗斯政治的走向。

可见，对俄罗斯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大致包括四类：政治领袖及其顾问；政治精英（联邦-地方；政治-行政）；商业精英；知识精英。^①因此政治观念传播-接受的一般过程，可以认为是经由政治领袖创造、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讨论、知识精英扩展的。当然，这一过程只是一种粗略的描述，实际上也可能存在一个逆向的过程，即政治观念经由知识精英或商业精英提出，政治精英讨论，政治领袖接受。还可能存在某种复合的过程，即在政治领袖创造某种特定观念之前，观念本身是由商业或知识精英提出，观念本身的内涵和影响都已经得到了详细的讨论和评估，继而再由领袖正式采纳，政治精英推行。因此，如果要理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进程以及把握其走向，就有必要对政治领袖、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四者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分类、对比与跟踪研究。

除了对精英从影响力角度进行分类之外，学者们还尝试直接从精英的政治观念角度对其进行区分。一部分学者倾向于从经济角度解释俄罗斯精英阶层政治观念的变化。依据俄罗斯精英对国家发展道路以及自己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尤金（А.А. Иудин）将其大致分为崇尚正统自由主义（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либеральны）、温和自由主义（умерено-либеральный）和寡头政治（плутократический）三类。^②其中正统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是出于对市场自身价值的肯定。他们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国家不应对个体之间的经济行为进行干涉。这一观念的传播主要是由于外来资本的冲击，致使俄罗斯出现了一个依靠国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崛起的商业群体。温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将国家视为建立市场机构的伙伴。他们认为，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并实行社会导向的经济政策。因此国家权

① 这一分类方法也可以得到许多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佐证，详细描述可见李雅君、张昊琦：“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演变”，《俄罗斯学刊》，2013年06期，第18-26页。

② Иудин А.А. Соци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населения и масс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1988-1999 гг.). НИСОЦ, 1999. С.52-55.

力不应该干涉，而应该鼓励富人阶层的商业活动。对他们行为的调控也应该限于是否违法的审查。这一观念的传播则主要是由于与外来资本相对的民族资本的形成，因而逐渐出现了一个依靠国内市场的商业群体。而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则强调国家应当对社会的经济环境进行严格的管控。他们认为，国家权力与富人阶层、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应当加强联系，并加大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根据这一观念，国家实际上就是大型资本的工具，只应执行富人阶层和统治阶层的意志。支持这一观念的人物多数是官僚，或与官僚阶层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的商业群体。

也有许多学者尝试以对意识形态进行分类的方式，探讨俄罗斯政治观念的变化。早在 1993 年，纳扎罗夫（М.Н. Назаров）就提出可以从对自由、平等、公正、个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干涉经济的不同认知来评估俄罗斯的政治光谱。他提出 7 个衡量标准：国家应该保障所有人都有劳动的机会；自由是最高的价值，甚至可以以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代价；国家应该管控商品的价格；人应该依靠自己而非等待国家的帮助；历史证明，民主会带来自由与繁荣，而社会主义则不然；国家应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现在是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负责，因此社会正义已经失去意义。根据答案，他将当时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分为 5 类：自由主义（либерал）、平均主义（эгалитарист）、实用主义（прагматик）、国家社会主义（сторон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和折中主义（эkleктик）。^①而 2000 年佩图霍夫（В.В. Петухов）的研究则表明，俄罗斯精英已经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将理想的国家类型描述为社会国家（соци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在共同福祉（общее благо）高于个人自由（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свобода）的立场上团结一致。^②社会国家意味着一方面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一方面也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系统。因而在政治观念中也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占据主流。且绝大多数人无法完全认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即便如此，在是

① Назаров М.Н.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ый период//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3. №.8.

② Петухо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и и поведение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0. №.3.

否支持现行政治体制，是否支持民主价值，是否反对重新审视私有化的结果等方面，依然表现出威权与民主、改革与保守（或传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价值选择上的区别。在改革过程中获益的群体更加支持民主政治，支持自由主义价值，支持现行政府；而在改革过程中受损的群体则更加支持威权政治、共产主义价值，并更加积极地要求政权的更迭。近期，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一些新的趋势，并开始尝试将诸如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兴或复兴的意识形态纳入俄罗斯政治思想研究的视野。^①

除了从横向上分析特定时期精英所持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学者们还尝试从纵向上划分俄罗斯政治观念变迁的总体趋势和时期。例如切尔尼科夫（Г.В. Черников）就将 1991-2004 年间的政治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1993 年间的自由主义阶段，1993-1999 年间的威权-保守主义阶段以及 2000-2004 年间的共存阶段。^②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想的集体自由主义转向。整个社会都对自由主义改革充满了期待，对政治机构高度信任、评价积极，甚至于愿意以短时间的经济停滞为代价推动政治改革。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都会使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词汇和语言。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倾向开始出现分裂。社会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普遍下降，认为它并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对西方的态度从友好转向敌对，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倾向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观念。民众既向往个人自由，也呼唤一个强力的国家政权。政治精英的自由主义词汇逐渐向保守主义过渡，强调诸如集中化、秩序、国家调控等观念。第三个阶段的特征是俄罗斯社会中政治观念的巨大差异开始逐渐弥合，社会对立程度开始降低。社会普遍高度评价政府的工作和稳定秩序的努力。民众开始欢迎威权国家。各个意识形态派别间的差别开始消失，对待政治和经济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化。常常可以观察到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融合。2015 年杜特科维奇（Петр Дуткевич）^③等学者则倾向于将 1989-2015 年间俄罗斯政治观

① Светлов Р.В, Богатырев Д.К, Кожурин А.Я. и др. Идеологии и генезис ценно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РХГА, 2016.

② Черников Г.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в.: тенденции эволюции. М.-Берлин: Директ-Медиа, 2016.

③ Совгавители: Петр Дуткевич, Ричард Саква, Владимир Куликов.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после СССР.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念的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分别为 1989-1993 年的政治体制崩溃、政治体制改革阶段；1994-1997 年的政权努力稳定秩序阶段；1998-2000 年的政治体制的系统性危机阶段；2000-2008 年的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巩固阶段；2009-2012 年的经济危机和系统性危机再起阶段；2012-2015 年的保守主义动员阶段。^①切尔尼科夫强调俄罗斯政治观念的共识-分裂-新共识的历程，这一过程从政治倾向来看，则是从一个极端的共识到分裂再到另一个极端达成共识。相对而言，杜特科维奇的分类方式则强调俄罗斯在转型的 30 年间经历了两个改革-稳定-系统性危机的周期。每次周期之后，政治领袖与政治精英都会反思并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可见，虽然对各个时期的描述不同，但二者的分期方式大致相似，且都强调俄罗斯政治观念的发展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虽然学者们已经对政治观念的纵向变迁、政治观念的横向分类、政治观念主要来源和传播过程有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观念、政治精英和档案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确定且清晰的。

这一不确定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对政治思想演变有重要影响或集中体现某一时期某一派别观念的精英和团体，常常是变动的。政治精英常会由于选举、职务变动、政党改组、机构设置与撤销等各种原因，参与或退出核心政治观念的讨论。因而对政治观念的变迁进行研究，必须首先确定围绕某一观念进行讨论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精英。例如，国家体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观念，是理解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政治思想变迁的关键。叶利钦国家体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联邦与地方关系的阐述，即阐述他在国家构建方面的理想和目标。因而这一观念最直接的讨论者就包括利益相关的地方精英。但在 1991-1999 年间，代表俄罗斯地方精英利益的机构，发生了从最高苏维埃到联邦委员会的一系列变化。因而与叶利钦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政治精英，也就从 1993 年前的 HAS 布拉托夫变成了 1997 年的斯特罗耶夫。1994 年以后，HAS 布拉托夫随着最高苏维埃的改组离开了政治观念

^①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од. Ред. Шестопал Е.Б, Селезневой А.В. М.: Аргмак-медиа, 2015.

讨论的中心，就任俄罗斯经济大学；而 2001 年以后，斯特罗耶夫也卸任联邦委员会主席，回到奥廖尔州担任职务，离开了这一讨论的焦点。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必须同时结合并比较哈斯拉托夫和斯特罗耶夫两人的观点。

其次，即使相对比较确定的、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团体，其代表人物和重要文本也常常是变动的。不同的政治团体和精英，由于政府法令、组建时间、活跃领域、内部改革、发展不健全等各种原因，不同时期反映其立场与倾向的文本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因此研究某一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团体和精英，须在把握其发展史的基础上确定不同时期的重点文本。例如，章程（Устав）始终是了解某一政治团体或组织机构最为直接也最为标准的材料。但一方面，由于俄罗斯政党体系发展不完整，许多政党在发展初期并未制定章程，或章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变化。例如，俄罗斯自由民主党（ЛДПР）正式建立于 1992 年，但直到 2001 年的代表大会才制定了自己的章程；亚博卢联盟（Яблоко）脱胎于 1995 年的社会政治联盟，但直到 2001 年建立政党时才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另一方面，作为最大反对党的俄罗斯共产党（КПРФ），在 1991-1993 年间无法正常开展活动，因此直到 1993 年 2 月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时章程才得以制定。但是，许多政党在前期都制定了自己的纲领（программа）。自由民主党 1990 年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纲领，俄罗斯共产党 1993 年也有相应的纲领对自己的行动目标进行阐释。因此这一类文本就可以作为研究政党这一时期活动的主要材料。

另外，即使政治倾向比较明确且长期活跃于政坛的政治团体或精英，其侧重的文本与材料也是不同的。某一政治团体或派别的代表人物，由于其个人行为方式和话语风格的不同，所倾向于选择的表达自己观点的途径也就会有所区别。因此在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精英时，须结合他的个人偏好确定分析其政治观念的主要材料。例如，亚夫林斯基喜好通过著作、政论、文章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看法；日里诺夫斯基则更倾向于在采访、演讲、报告中，采用简短但强有力的观点来表述自己的理念；久加诺夫则常会以一个全国性政党领袖的姿态，向全俄人民或全俄罗斯发表号召或演说。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精英纷纷开始采用新的渠道和技术来

宣扬自己的观点，因而相关的文本也逐渐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同时，研究政治精英的材料开始逐渐呈现出碎片化、非常规化的特征，例如采访（интервью）、公开发言（выступление）和网络会议（интернет-конференция）逐渐增多。这部分材料的优势在于，能够及时地反映特定人物对特定事件的观点。但它的劣势同样明显。相较于传统材料对政治价值和目标系统理性的分析与表述，它显得更具随意性与偶然性，有时还会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这一趋势也被称为“后真相政治”。

三、非传统材料的出现：后真相时代的挑战

牛津大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确定为 2016 年年度词汇（word of the year）。关于“后真相”一词，牛津大词典的定义是：某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客观事实对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影响远小于诉诸情感或个人信仰（的语言）。^①也就是说，“后真相语言”或“后真相时代的语言”，就是用极富情感或与个人信仰紧密相连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态度并形成舆论，至于真相如何则无关紧要。换言之，即“态度重于事实”。牛津大词典网站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是：“‘后真相’从一个边缘的术语逐渐成了政论中的主流，现在经常被大型出版机构所使用，甚至不需要在标题中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定义”；同时，这一词汇主要出现在“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和美国的总统选举语境中，并且绝大多数和一个特别的名词相联系——‘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②。

显然，这样的“后真相政治”并不单单出现于英、美两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伴随着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后真相语言”与“后真相政治”都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领袖的青睐。在世界政治的范围内，随处可见大量非理性的表述，空洞却强有力的口号，精巧的比喻与夸张。可以认为，不理性、不系统、不冷静的政治语言，正在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逐渐挤压传统政治语言的空间。

①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② Ibid.

从理论角度看，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研究者未来可能会不得不面临大量非传统材料的挑战。推特上一则短小的笑话，演说中一个精妙的比喻，辩论中一个自造的词汇，其流行范围和接受程度可能都要远高于传统的国情咨文、政府工作报告或法律草案。因此，对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来说，研究者必须提前为后真相语言的分析进行分析方法和分析经验的积累，否则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面临研判政治走向准确率的大幅下降。

从实践角度看，在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对派和抗议者，以及国外大量政治领袖，都对后真相语言与后真相政治驾轻就熟。普京作为一个仍有选举压力的总统，能否坚持不使用这样的语言？即使他能坚持，其同阵营的政治精英能否抵抗住选票的诱惑？如果不提早关注这类后真相语言的交锋，很可能会失去对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的把握。

政治学家约翰·基恩将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语言分为三类：谎言（Lying）、狂言（Bullshit）和插科打诨（Symbolic buffoonery），而后真相话语的出现常常是以沉默（Silence）为基础的。^①谎言的特点是“讲述某事时，讲述者的描述和其所思所想并不一致”。狂言的特点是“口无遮拦，并且强迫他人接受”。插科打诨的特点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话语，为了吸引或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通常表现为废话、笑话或吹牛，常伴随有精巧的嘲讽、卖弄或者故意的夸大其词”。沉默的特点是“隐藏一些不希望被他人注意到的事物”。简而言之，谎言即是“明知真相而不顾”，狂言即是“不屑真相，‘我即真相’”，插科打诨即是“扭曲真相”，沉默即是“刻意回避真相”。

实际上，即使在“态度重于事实”的后真相语言与后真相政治中，依然存在对政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可能性。毕竟政治思想本身就是政治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后真相语言”依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使用者和接受者对政治现实的理解、反思与诉求，甚至体现出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心理结构。

例如，在2017年12月14日举行的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普京提到了这样一个笑话：

^① 约翰·基恩对后真相的分类方法出自于2017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一个退役的军官走到自己儿子跟前，问：“儿子，我原先的一把短剑呢？”

儿子回答：“爸爸，您别生气，我把您的短剑拿去和院里的孩子换了一块表。”

军官说：“那你想象一下吧，明天会来一群强盗，他们会杀了我，欺辱你的姐姐。到时你再走出去和他们说，晚上好，现在是莫斯科时间12点半。”^①

这个笑话是普京针对记者关于军备竞赛与《中导条约》问题的回应。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笑话最直接的解读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体现了俄罗斯在近年来一如既往将美国作为竞争的主要对手，并对美国在《中导条约》问题上的指责表示反感；其次是反映了俄罗斯近年来对于《中导条约》逐渐增长的质疑情绪；最后是表现了近年来俄罗斯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的外交政策。

但是，这一笑话被提及的场合及笑话传播的对象是俄罗斯举办的年度大型记者会，因此其影响力可能并不仅限于对于外交政策的简短评述。实际上，这一笑话有着可资解读的巨大空间。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真相”表述：精巧的比喻、鲜明的象征、荒诞的结论；极端夸大的描述、极端贬低的批评、极端强烈的对比；预设语境，预设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从角色角度分析，这则笑话中共存在父亲、儿子、女儿/姐姐、邻居孩子、强盗们五类角色。

从关系角度分析，这则笑话中共蕴含了父-子、父-女、姐-弟、家人-邻居、家人-强盗、邻居-强盗六种主体关系；父、子、女、邻居孩子、强盗与短剑和手表各自的主客关系；短剑与手表间的客体关系。

从客体角度分析，这则笑话中包含了短剑与手表两种事物。

从环境角度分析，这则笑话营造了家庭、院里、院外三重不同的环境。

父亲的职业是一位退役的军官，他持有作为“武器”或“军事力量”、“国家暴力”的短剑。短剑是这个家庭唯一或者至少最为重要的财产，它可

^① <https://politexpert.net/81703-putin-razveselil-zhurnalystov-shutkoi-pro-syna-oficera>

以被用来交换其他的重要财产，如手表。因此可以认为，父亲代表并负责了整个家庭的安全、秩序与财富。他对家庭中的财产具有支配权，对家庭中的个人具有训诫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支配权。

儿子在家庭中一无所有，同时对家庭财产没有任何支配权。他只能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地转移家庭财产与外界进行交换。但儿子本身并非无足轻重。他是父亲之后家庭中唯一的男性。他必须在父亲被强盗杀死之后承担起维护家庭和自身安全的责任。并且，在这段对话中，实际上是他在父亲支配着的“短剑”和邻居孩子支配着的“手表”之间进行选择。他有潜在的能力影响父亲的选择和决策。因此可以说，儿子和父亲共同构成了家庭的主导者。儿子渴望象征“效率”、“经济”或“财富”手表。但在这段话语中，儿子是愚昧的，因为他并不明白短剑的重要性。他只看到了事物的商业价值（“效率”、“经济”或“财富”），却忽略了事物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的政治价值（“安全”、“秩序”和“稳定”）。

女儿/姐姐在家庭中同样一无所有。不仅如此，她连潜在的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利也不具备。在这段话语中，她也没有表露出对短剑和手表的任何倾向。相比较而言，邻居孩子具有对财产的一定支配权，同时对财产的价值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选择倾向：他持有手表，并希望通过交换来获得军官家庭的短剑，也就是说，他认为短剑的价值高于手表。而强盗们对于这个家庭的财产的态度也可以从其行为中得到反映。当家庭只持有短剑不持有手表时，强盗们不会入侵家庭；当家庭只持有手表不持有短剑时，强盗就会入侵家庭。因此可以总结说，强盗对于短剑价值的重视也是超过手表的。

	父亲	儿子	女儿/姐姐	邻居孩子	强盗
短剑	支配； 重视	不支配； 不屑	不支配； 无话语权	重视	畏惧（重视）
手表	不支配； 不屑	支配； 重视	不支配； 无话语权	不重视	不畏惧（不重视）

由图表可见一个父亲提出的简单逻辑：在五个角色中，所有人都不重视手表，只有儿子重视手表；而其他四个人所重视、渴望、畏惧的短剑，恰恰又是儿子所不重视的。因此重视短剑而不重视手表，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和

大众心理的价值选择与行为方式，于是儿子理所应当服从这样的逻辑。

在这样一则不足百字的笑话中，存在着至少两类重要关系，一类是“家中人”，即父亲-儿子-女儿关系；一类是“家外人”，即家人（父、女、子）-院中人（邻居孩子）-院外人（强盗）。这与笑话所营造的家庭、院里、院外三层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关于“家中人”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父亲和儿子共同构成了家庭的主导者，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在家庭中是缺失的，只能扮演被保护者的角色，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利，也没有保护自己的 ability。因此，父亲与儿子之间能产生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行为不需要经过母亲或女儿的缓冲与调节。整段话语是以父亲训诫儿子的方式展开的，因而可以从此看出父亲在父-子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同时，父亲的训诫展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当父亲被强盗们杀死后，儿子就必须直面外来的威胁。这就再一次凸显了父亲的主导者角色及其在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不过，由于儿子具有潜在影响家庭财产的能力，并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因此父亲对儿子的训诫也可以视为一种沟通和协商。父亲通过语言的沟通向儿子展示了自己“安全至上”的持家原则，并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和荒诞的假设说服了儿子。实际上，父亲成功通过这样一种后真相的话语，处理了家庭财产转移和家庭价值选择的危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加强了自己的权威。

其次是“家外人”的关系。在家人、邻居与强盗关系中，这段话实际上构建了家庭、院里、院外三层不同的区域。在“院外”的区域，存在一批强盗的角色。他们并不觊觎家庭的财产，而是单纯复仇式的强盗。入侵家庭后，他们并不劫掠家庭的财富，没有任何威逼和欺骗，直接选择进行人身伤害——先杀父亲，再欺负姐姐。在“院内”区域，存在着“院子”与“邻居孩子”的概念。“院子”里是相对比较和平的，邻里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敌意。同时，家庭财产的交换行为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而非成人与孩童之间，这就使得诱骗和欺诈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个“院子”并非安全或秩序的基本单位。当强盗们入侵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拥有短剑的邻居有意愿或有能力伸出援手，将整个“院子”作为抵御强盗们的共同体。能够完成这一功能的只有作为核心区域的家庭。短剑本身是属于家庭

且为父亲所支配的，因而只要家庭和父亲还拥有短剑，强盗就不敢入侵。

在这段话语中，非常隐晦但极其重要的一组关系，是短剑与手表两个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二者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二者所象征价值的排序。这段话将短剑与手表两件事物置于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面前，并且给出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强烈的价值导向——只有拥有短剑才能维护家庭的安全和秩序，因此必须放弃手表。并且根据家庭长期拥有短剑而不拥有手表的情况看来，没有手表的情况是可接受的，但没有短剑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家庭的秩序必须建立在短剑、而非手表的基础上。

如果将短剑的象征意义理解为“武器”、“军事力量”或“国家暴力”，同时将手表的象征意义理解为“效率”、“经济”或“财富”。那么，这段话暗示的含义即是，在国家政治当中，“安全”的价值高于“发展”，二者不仅矛盾，而且国民应该选择“安全”。至于“发展”与否则是无关紧要的。但实际上，这对矛盾中的双方并非必须处于完全极端的对立情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斯巴达式的纯军事国家，或在极端历史时期、极端情况下必须首先满足基本安全需求，那么其国防开支和经济发展之间预算的分配就更多是一个比例问题而非选择问题。另外，这里的“安全”是狭义上的“国民安全”、“领土安全”或“军事安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安全”等含义。

同时，如果认为在这则笑话中父亲象征国家权力，儿子象征国民，那么就可以认为，国家权力在国民面前扮演了一种父亲的角色，相对而言，国民则需要扮演一个顺从的且能承担责任的儿子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国家权力是人格化的，它具有了父亲、军官、家长等诸多含义，并且模糊了政治领袖、国家权力与人格化主体各种身份之间的界限。同样，国民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人格化的，它作为儿子，与国家权力/政治领袖之间是一种家庭成员的关系，它应该敬仰、服从父亲，并与父亲一起承担家庭的责任。实际上，在这段话语中，主体和喻体，笑话形象和象征意义间的关系，比笑话本身的简单逻辑与荒诞结论更加值得重视。这可能是政治领袖思想中政治观念更为直观的体现。如果相似的比喻一再出现，那么未尝不可以认为某种政治观念已经出现深刻变化。

从这段笑话中，我们同时也可以从政治语言（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чь）的选择倾向、政治语言的风格角度进行分析。俄罗斯政治学者帕尔申娜（О.Н. Паршина）就曾评论普京，认为他的政治语言是最有素养的。这一素养体现在对于语言策略极富效率的选择当中。^①对于语言策略的选择，往往能反映一位政治家的情感倾向。如果语言策略的选择出现变化，极有可能暗示着政治家本人的政治观念或政治倾向也在随之变化。例如在这段笑话中，政治家可以选择理性却刻板的表述——“我们需要加大国防投入以维护国家安全”，也可以选择激进且骇人的表述——“外面有个强盗会来杀死全家，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在这两个极端当中甚至有着更加微妙的选择可能性。如果这个笑话是更加温和的版本，父亲也许会说，“当强盗来抢走你的手表时，你可以告诉他现在是莫斯科时间十二点半”。但父亲仍是选择营造了一种对家庭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胁。也许有一点值得庆幸，这个笑话的表述始终是防御性的。笑话中的军官父亲并没有想自己成为强盗，也承认了儿子的交换行为。他的对外态度始终是比较安全的。但这对家庭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倾向，实际上已经不言而喻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后真相话语的分析应该以内容本身为界限，不应做过多的延伸推测。例如，邻居家孩子是否拥有短剑？如果拥有，那么囤积短剑是否表现了一种军备竞赛的倾向；如果没有，短剑是否就是院中唯一的武器？由于后真相话语本身内容的简短，几乎不可能有辅助材料或进一步的材料来确证这些问题。因而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猜测。此外，由于内容简练，只有主角的形象比较丰富，次要角色的想象往往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但这种详略分配可能本身就是话语的设计和安排。例如，如果说“家里人”的关系和指代相对明确，那么“家外人”的所指就会模糊得多。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就不能妄加推测。直接认为普京在笑话中以“强盗”指代美国并不恰当。这既可以指对俄罗斯有敌意的国家，也可以指有能力威胁俄罗斯的国家。这两类国家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同时，如果从“家里人”的角度入手分析，这里的“强盗”未尝不可能意指俄罗斯国内外的种种威胁。犯罪现象、分裂势

^① Паршина О.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чь: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 URSS, 2011. С. 147.

力、边疆威胁、恐怖主义都可能是指代的对象。而这一“敌人”含义的模糊和泛化，恰恰可能加强“敌人”概念的想象空间，加深民众的不安感。因此，相对不断就一段话语进行解读而言，更为合适的方法是继续积累材料，进行不同案例、不同文本的解读，对比并融合其共有的角色、关系、语境，不断修正对后真相语言进行分析的框架。

这则笑话不过百余字，对其进行如此复杂的分析，会不会是一种过度解读？

如果说“这一概念是出于普京的精心设计”，那么这必然是一种过度解读了。

这个笑话本身并不新鲜，也不是普京的原创，如果对其进行搜索，能发现 1.26 亿条结果。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话语，它注定有着极强的传播能力。仅仅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 3 天的时间里，搜索引擎“yandex”上就出现了至少 2000 余条有关报道。也许绝对数量并不惊人，但如果参考另一则数据，“普京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数量一共为 1.4 万余条，也就是说，至少 15% 的媒体转载了这一笑话。

但进行这一解读的目的并非是要分析普京的人格，而是为了分析，这样一种笑话或后真相时代的语言从政治领袖口中说出时，反映了整个国家一种怎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或者体现了当前怎样的一种心理结构？它给精英和民众分别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前俄罗斯对政治心理、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的研究，大多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一种是进行深度访谈。例如，研究民主观念时，让受访者就“与民主相联系的概念”进行排序，或者研究国家观念时，将其拆分为“什么是联邦”、“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有宪法”、“什么是理想国家”四个问题让受访者进行自由回答。^①这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给予某个特定观念以最大的解释空间，从而避免了先入为主的引导式提问。但这类方法的缺陷在于，受访者的阐述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由于研究行为取决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① Селезнева 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и ц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ГУ, 2012.

在对不同国家当前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话语进行研究时，核心政治概念的解读与研究假设的提出，都是其重要基石，从而也通常会成为研究最大的障碍。由于不了解对象国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心理结构，政治思想研究常会遇到生搬硬套的问题，即将一国的经验或标准，或某种通行的经验与标准直接套用于对象国的研究之中。昆廷·斯金纳曾经指出过政治思想研究中历史语境的重要性：“倘若我们需要了解早先的社会，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宽容地持同情的态度去重新发现这些社会的不同精神状态。”^①而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在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无论是长时段的政治文化传统或短时段的政治心理结构，都很有可能在这类情绪化的话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本文的分析，更多是为研究俄罗斯的政治概念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

例如，从角色分析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探索国家权力与国民的关系。谁能影响国家政策的走向？国民的政治参与是否有效？国民应该服从国家还是国家应该尊重国民？国家与国民间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还是间接的关系？从关系分析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探索“家中人”、“院里人”和“院外人”的关系。可以探究在当代俄罗斯精英和大众的政治观念中，“院外人”、“院里人”、“家里人”分别是谁？“院外人”或对手是否天然对俄罗斯具有敌意？他们的敌意主要在于哪些方面？他们的敌对情绪有多高？他们对俄罗斯是怎样的战略意图？从客体分析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探究，当前俄罗斯最需要发展的领域是什么？这些发展的选项是否是互斥的？其先后是否有次序？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探究，当前俄罗斯精英所喜爱的更多是怎样的语言？俄罗斯大众更加接受的是哪一种语言？政治精英所选择的语言策略是在分化还是趋同？等等。实际上在研究中，俄罗斯学者已经或多或少采用了这些研究角度或方法，例如舍斯托帕尔（Е.Б. Шестопал）在对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心理进行分析时，设计了问题“您是否认为什么权力高于个人”，并提供了四个选项：“国家权力”、“领导权力”、“法律权力”、“个别人的权力”^②。

① [英]昆廷·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

② Шестопал Е.Б.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ежду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ми 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ми выборам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7. Том.8. №.2.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对后真相语言中的形象、后真相语言的载体以及后真相语言的象征意义，进行相关性研究。这里的载体既包括后真相语言的使用者，也包括后真相语言所针对的接受者。例如，既可以对父亲-普京-国家权力三个概念进行相关性研究，也可以对儿子-俄罗斯国民-个人权利三个概念进行相关性研究。在这样的研究得出结论后，还可以尝试性地用后真相话语中设计的框架，对这两组关系进行关系研究。例如提出一些可能的假设：俄罗斯政治领袖如何认知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尊重、协商还是引导？俄罗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谁，是普京、政治精英、直接领导还是法律？俄罗斯国民如何评论自己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关系，是服从、参与、协助、监督还是反对？带着这些直接的问题，可以探索一些更加深层次也更加普遍化的问题，例如俄罗斯当前国家权力是否人格化，俄罗斯政治中家长作风是在增强还是在降低，俄罗斯政治领袖是否纷纷选择扮演一种父亲的角色。这些看似粗鄙实则精巧的后真相时代的非常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俄罗斯政治的总体趋势和真实逻辑。善于运用这些材料的帮助，将帮助研究者加深对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想的理解程度。

四、结语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思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理解研究。政治思想研究则是研究人对政治的认知、想象与讨论。政治思想既包括个体进行政治行为的动机，即需求、价值、立场、感觉等，也包括个体为达到这些目标、完成政治行为所准备的工具，即知识、信息、利益和信仰等。因此，政治思想研究也由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政治价值与政治实践。关于政治价值的讨论，是为政治共同体提供发展的目标与方向；而关于政治实践的讨论，则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警示障碍并提出方案。

政治思想研究的意义基于这样一种原则：任何一个政权是否能够施加政治影响，都取决于政治共同体内的个人对政治具备一定基础认识，具有一定的态度，并能采取一定的行动。简而言之，在政权和个人行为之间存在一个

互动的空间，这就是政治思想。^①对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对人们关于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践的认知、想象和讨论进行分析，将是理解、判断、预测某一政治共同体政治行为的重要途径。

而政治思想研究具体反映在研究对象上，就是政治观念、政治人物与派别、文本与档案。因而，无论是政治观念和话语的替代与更迭，或是文本档案性质、类别、渠道、平台的变化，再或是政治人物与派别立场、论述、阐释方式的演变，恰恰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对于政治问题认知和理解的变迁过程。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和后真相的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材料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都出现了飞速增长的趋势，同时，大量非常规、非传统的材料也逐渐出现在政治话语当中。因此，相对于传统思想史研究，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材料都有着更大的复杂性。从形式上来说，材料的数量、种类、特点都在日益增多，且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从内容上来说，不再完整、周密、理性、系统的材料比例日益增大，且呈现出碎片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在运用思想史方法对当代政治思想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继续完善传统的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观察某一政治观念及其使用者所受到的时代约束，包括观念背后的利益、价值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另一方面还必须重视政治观念使用者对价值和工具的主动选择。毕竟这样一种诸如政治立场或语言风格的转换等的“主动性”，正是理解政治变迁的关键所在。

【Abstract】 When employing intellectual historic methodology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s, scholars should tak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aterials at different times into consideration, reflect upon and improve their methods. In this information-based and post-truth era,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 is facing two challenges, namely, changing traditional materials and increasing 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Traditional materials are systematic but uncertain, while 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are fragmented and emotional.

^① Шестопал Е.Б.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фил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90-х.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154.

Therefore, for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s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a basic research framework should be set up with three elements, namely, political ideas, political figures and factions, in addition to texts and archives. Meanwhile, traditional materials should be classified and tracked. On the other hand, non-traditional materials should be observed and analyzed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roles, relationships, objects, environment, symbols and languages. Moreover, a dynamic perspective should be kept on researches of these two types of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studies, it is just changes of materials that often symbolize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figuration and trends.

【Key Words】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s, Russian Political Figures, Russian Elites, Russian Political Ideas, Russian Political Discourse

【Аннотация】 Учёные, используя метод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должны учитывать различ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сно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разные эпохи, а также отражать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да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настоящую эпоху информатизации и постправды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стоит перед проблемой как изменен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так и увеличения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систематичностью 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ю,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фрагментацией 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стью. С целью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ть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рам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политиков и фракций, а также архивных текстов, проводить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и отслеживат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оздать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шести аспектам: роль,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объект,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символ и язык, а также отслеживать и анализировались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боих типов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олжно основываться на динами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 именно изменения сам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часто символизируют эволю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и тенденц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ли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